

中医临床学基础

湖南中医学院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R24
1
3

BT48/12

中医临床学基础

湖南中医学院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三月

A442988

中医临床学基础

湖南中医学院編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郴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7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统一书号：14109·84 定价：1.00元

前 言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学院和各兄弟单位一样，教育革命和卫生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形势一派大好。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医学中药学，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号召，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大搞中西医结合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为了适应当前教育卫生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教导，在修订我院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中医临床学基础》。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虽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够，路线觉悟不高，业务能力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特别在批判继承我国医学理论上所作的尝试，错误更是难免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湖南中医学院《临床学基础》编辑组

1975年3月

毛主席语录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祖国医药学的发展梗概	(1)
第二节 人与自然	(8)
第三节 阴阳五行	(12)
第二章 脏象学	(22)
第一节 脏腑的功能	(23)
一、五脏	(24)
二、六腑	(34)
三、奇恒之府	(37)
第二节 脏腑相互间的关系	(45)
一、脏与脏的关系	(45)
二、腑与腑的关系	(49)
三、脏与腑的关系	(50)
第三节 五脏与形体官窍	(52)
第四节 精神、气血、津液	(56)
第三章 经络学	(64)
第一节 经络的分类与命名	(64)
第二节 经脉的特点	(66)
第三节 经络的作用	(69)
第四节 十四经脉	(72)
一、手太阴肺经	(72)
二、手阳明大肠经	(74)
三、足阳明胃经	(77)

四、足太阴脾经	(80)
五、手少阴心经	(82)
六、手太阳小肠经	(84)
七、足太阳膀胱经	(87)
八、足少阴肾经	(90)
九、手厥阴心包经	(92)
十、手少阳三焦经	(93)
十一、足少阳胆经	(96)
十二、足厥阴肝经	(98)
十三、督脉	(101)
十四、任脉	(103)
第五节 经络实质的研究	(105)
第四章 病因学	(110)
第一节 发病原理	(110)
第二节 致病因素	(113)
一、六淫	(113)
二、七情	(120)
三、饮食	(121)
四、外伤	(122)
五、其他因素	(123)
第三节 病理变化	(123)
一、病情演变	(124)
二、脏腑病理	(127)
三、经络病理	(135)
四、气血津液病理	(140)
第五章 诊断学	(146)
第一节 问诊	(146)
第二节 望诊	(151)
一、神色形态望诊	(151)

二、舌象望诊	(154)
三、耳廓望诊	(165)
四、眼鼻唇齿望诊	(165)
五、皮肤望诊	(166)
六、分泌物和排泄物望诊	(167)
七、小儿指纹望诊	(168)
第三节 闻诊	(169)
一、听声音	(169)
二、嗅气味	(170)
第四节 切诊	(171)
一、切脉	(171)
(一)切脉的部分	(172)
(二)正常脉象	(173)
(三)病理脉象	(174)
1.浮脉类	(175)
2.沉脉类	(176)
3.迟脉类	(177)
4.数脉类	(179)
5.虚脉类	(180)
6.实脉类	(181)
(四)切脉的注意事项	(182)
二、触诊	(183)
第六章 防治学	(185)
第一节 预防	(185)
第二节 治法	(186)
一、治疗原则	(187)
(一)扶正与祛邪	(187)
(二)治标与治本	(189)
(三)正治与反治	(191)
(四)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193)

二、治疗方法	(195)
(一)解表法	(195)
(二)涌吐法	(196)
(三)泻下法	(197)
(四)和解法	(198)
(五)表里双解法	(200)
(六)温里法	(200)
(七)清热法	(201)
(八)开窍法	(202)
(九)祛风法	(204)
(十)安神法	(105)
(十一)补益法	(205)
(十二)固涩法	(207)
(十三)消导法	(208)
(十四)理气法	(209)
(十五)理血法	(210)
(十六)祛湿法	(212)
(十七)润燥法	(213)
(十八)祛痰法	(214)
(十九)驱虫法	(216)
(二十)痛疡疗法	(217)

第七章 证治学总论.....(218)

第一节 八纲辨证.....(219)

一、表里	(219)
二、寒热	(221)
三、虚实	(224)
四、阴阳	(225)

第二节 伤寒证治.....(228)

一、大阳病证治	(229)
二、阳明病证治	(233)

三、少阳病证治	(236)
四、太阴病证治	(239)
五、少阴病证治	(240)
六、厥阴病证治	(244)
第三节 湿病证治	(248)
一、卫气营血证治	(249)
(一)卫分证治	(250)
(二)气分证治	(252)
(三)营分证治	(255)
(四)血分证治	(256)
二、三焦病证治	(258)
(一)上焦病证治	(258)
(二)中焦病证治	(259)
(三)下焦病证治	(261)
第四节 杂病证治	(263)
一、肺病证治	(263)
二、心病证治	(265)
三、脾病证治	(267)
四、肝病证治	(268)
五、肾病证治	(271)
六、胃病证治	(273)
七、胆病证治	(274)
八、小肠病证治	(275)
九、大肠病证治	(276)
十、膀胱病证治	(277)
十一、脏腑兼病证治	(278)
第八章 证治学各论	(286)
第一节 身形病证治	(286)
发热	(286)
痉证	(290)

痹证	(293)
厥证	(296)
痿证	(297)
第二节 脏病证治	(300)
咳嗽	(300)
喘证	(303)
哮证	(305)
痰饮	(307)
黄疸	(309)
水肿	(311)
腹胀	(315)
积聚	(318)
心悸	(320)
眩晕	(323)
失眠	(325)
中风	(327)
癫、狂、痫	(330)
消渴	(334)
虚劳	(336)
遗精	(340)
第三节 腑病证治	(342)
呕吐	(342)
噎膈	(344)
呃逆	(346)
泄泻	(348)
便秘	(350)
淋证	(352)
癃闭	(354)
第四节 疼痛证治	(355)
头痛	(355)

胸痹	(358)
胁痛	(360)
胃痛(附：吐酸)	(362)
腹痛	(364)
腿腿痛	(367)
第五节 出血证治	(369)
咳血	(369)
吐血	(370)
便血	(371)
尿血	(372)
紫癜	(373)
附：方剂	(37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祖国医药学的发展梗概

中医中药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医药学科学发展的唯一源泉。在阶级社会中，医学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两千多年来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始终影响着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在劳动人民巨大力量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先进思想家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儒家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和反动思想家的唯心史观，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作用。

(一)

历史上进步医药学家往往同法家一样，也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和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战国时期著名医生扁鹊在流浪各地、到处为人治病的过程中，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识破巫医的虚妄，总结民间医药的经验，“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并明确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之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祖国医学的基本理

论逐渐形成。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内经》，总结了劳动人民和医家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为我国中医中药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明显地受到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影响。

对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对人体的解剖分析。《内经》指出：“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解剖分析的重要性和认识人体结构及各部功能的可能性。公元十一、二世纪，我国已有了根据实物绘制的人体解剖图谱。只是由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厚葬”、“祭祖”，散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谬论，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国解剖学的发展。

关于病因。先秦法家代表荀况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说明天是没有意志的客观存在，它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只要调理周到，按照时令活动，“天”是不能使人生病的。《内经》也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指出人们只要顺着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律，适应季节的变化，就不会生病。《内经》还从六淫、七情、饮食不节、劳倦、外伤等方面寻找致病因素。尽管这些论述还是朴素的，但是它有力地揭穿了儒家所宣扬的鬼神使人生病的迷信思想。

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为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为了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采取了

“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所不去者，医药……种树之书”，表明了他对医药的重视和保护。史料证明，到汉代就保存了大量先秦医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汉有医经七家，二百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中的佚书，也有医方一万多字，医学竹简二百枚，文体与《黄帝内经》相似。此外，在十二万多字的帛书中，《医经方》即达一万多字。这又表明西汉时期仍有大量医书存在，有力地驳斥了秦始皇“焚书”是文化“浩劫”的无耻谰言。西汉时期仍然坚持法家路线，我国出现了一部最早的药学专著《本草经》，总结了汉以前的有关药物学知识。可是，到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东汉以后，除《内经》外，其余的都湮没了。

东汉前期，著名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王充，坚持战斗的无神论，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东汉末年儒家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谶纬迷信风靡一时。当时进步医家张仲景，敢于冒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痛斥统治阶级和儒生“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通过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反复验证，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与此同时，杰出的外科学家华佗，不信天命，不信鬼神，主张积极锻炼身体，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作姿态，创造“五禽戏”，预防疾病。他还创“麻沸散”，作全身麻醉，“因割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胃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首创了外科的手术疗法。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成，华佗外科手术的创始，对祖国医学是两个很大的发展，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医学必须继续创新，才能有所前进。在张仲景和华佗开创上述医疗技术

时，反动儒家千方百计地妄图用唯心论的天命论对抗他们的学说，待到它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巨大的效果而被广大群众所采用以后，他们又把张仲景神化为“医圣”，把《伤寒杂病论》奉为经典，竭力提倡“言必称歧黄，方必遵仲景”，这种尊古、泥古的儒家思想又严重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二)

新的医疗技术和新的医学理论，总是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中产生的。从魏晋到隋唐五代七百多年的历史阶段中，进步的医药学家摆脱了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羁绊，继续前进，又有较全面的发展。在病源、脉学、针灸、药物以及临床各科等方面都出现了总结性的专著。晋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妇科的《经效产宝》，儿科的《颅囟经》，外伤科的《理伤续断秘方》和《刘涓子遗方》等，标志着医学的专科化和创新。在药物方剂学方面，也有蓬勃的发展，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就成书于此时。特别是法家、医学家刘禹锡，撰有《传信方》，用“天人交相胜”的论点批判了儒、佛的宿命论思想，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法家路线的影响下，由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药物品种增多。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所编的《新修本草》，是世界医学史上由政府最早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此外，雷敩的《雷公炮制论》反映了药物炮制和制药化学的成就。

宋代法家王安石，关心医学，旁通医理。他自己说过：“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在变法革新的过程中，王安石注重改革教育，设置了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科学，改革了太

学，新设了太医局，分为方脉、针、疡三科，实际上包括了各科病的诊断和治疗。在王安石的直接影响下，我国十一世纪杰出的科学家沈括，不但积极参加变法革新的政治斗争，还注重科学，对祖国医学也作了一定的贡献。他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了许多“目睹其验”的验方，编著了《良方》一书。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也有大量关于医药的论述。他极力反对儒家思想对医学的束缚，反对迷信古人，迷信书本。他对儒医把长期辗转传抄的《神农本草经》中误漏之处也盲目奉为金科玉律的怪现象提出了尖锐批判，指出这部书“最为旧书，其间错误尤多，医不可不知也。”，并根据科学实践，作了不少重要的订正。

宋、元革新派医家运用了王安石“天道尚变”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探讨了古典医学的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医学见解，开展了学术争鸣。如“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温补派”李东垣；“滋阴派”朱震亨，就是当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刘完素更明确指出：“若专执旧本，以谓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他根据自己的医疗经验，体会到治疗必须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突破了魏、晋以来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在热性病的治疗上创新法、立新方，开温病治疗的先河。

实践出真知。明朝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在实际调查研究中，积数十年之努力，集医药学之大成，写成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和《濒湖脉学》。还有吴有性经过深入实际调查和长期观察研究，对当时流行的瘟疫进行了总结，著成《温疫论》，确认传染病的病因并不是什么风、寒，而是一种“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并能“传染于人”。这在现代微生物学诞生前，实是一个重大的发现。